

恩师教我绘彩瓷

□ 李景海

今年5月,我的恩师,已故陶瓷彩绘先师张子宜先生精心绘制的提梁壶《麻姑献寿》,倏然在朋友圈展现,这距当初创作时间已经过去67年了,十分感谢藏家将此佳作慷慨亮相。在重新鉴赏之际,我的激动之情难于言表,回顾自己耕耘于陶瓷艺术园地近70年,悠悠往事涌上心头……

我从小喜欢画画,常看母亲绣花。母亲是位巧娘,描花绣凤乃属高手,常为出阁姑娘作嫁衣;我姥爷是一位老中医,毛笔字写得好,所以我很小就能拿毛笔练字了。1953年我考入唐山六中,在三年学习过程中,对我影响最深的当数美术老师苏凤超。苏老师是从部队转业到学校教美术的,每星期六下午我都去他宿舍看他画的水彩和素描作品,尤其爱看他画的米邱林头像,非常棒,简直令我着迷。他鼓励我好好学美术,打好基础,将来考美院深造,争取成为画家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我学美术走艺术道路的信心和决心!

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我的学院梦破灭了。1956年初中毕业那个暑假,父亲因病去世,家庭担子重压在身。母亲让我继续上学,但我决定为母亲分忧,顶工上班。按照当时政策,手工业联社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,分配我到东缸窑陶瓷社二厂学画瓷,这也符合我的志愿。

我于1956年8月27日到工厂彩绘室报到,遇到平生第一位绘瓷启蒙恩师张子宜先生。他是一位绘瓷高手,而且纸画底子也深厚,是丰润画派传人。老师为人正派,性格耿直,教画认真。我白天上班学画瓷(扁笔抹花),晚上跟先生一起在厂住宿,学习纸画工笔仕女。先生

对我要求严格,每晚必须坚持练画到十点,一张白描人物画稿要反复描画五十遍,以锤炼勾画线条之基础功力。

记得1957年的一天晚上,张老师跟我说:今晚你不必画画了,我应朋友之约画一个粉彩人物画,你在旁边看着,将来有用。这可是我学艺的好机会!先生先在纸上勾出画稿墨线并用打水打湿,反拍在瓷壶上,这叫拍稿。然后用胶性艳黑陶瓷色料勾线。先生功夫确实厉害,一晚上就勾完了全稿,画面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《麻姑献寿》。看上去,线条古拙有劲,粗细变化得法,人物形象生动,古松粗犷苍老,构图非常完美。第二天晚上,先生用我熬好的乳香油,开始用油性色料着色。先上景,后上人物,记得那天上色已经很晚了。这幅瓷画经烤烧后,明亮洁净,太漂亮了!先生对我说:好好学画吧,将来你也可以的!师傅的这句话鼓励了我一生。

张子宜先生是丰润袁各庄人,出生于1910年。少年学画,曾在丰润县画铺当师傅。新中国成立前,在德盛瓷厂绘瓷部画瓷,做师傅兼负责人。1952年在东缸窑陶瓷社二厂绘瓷部当负责人。1959年至1962年在天津美院陶艺系任教。1963年至1971年在唐山陶瓷工业学校(即后来的河北轻校)任教研组组长兼教学。1972年至1974年任唐山陶研所艺术室副组长,直至退休。

张子宜先生堪称唐山陶瓷界前辈、陶瓷艺术名家。他一生热爱绘画,为人真诚,严于律己。在不同的岗位上认真工作,用心教学,桃李满天下。

转眼先生已逝多年,但他的举止言谈,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,永远是我的恩师和学习的榜样。

常言道:学无止境,艺不压身,只有向多位前辈学习才会有更大进步。1959年成立东缸窑联合厂,我有幸到三合义出口瓷车间,又拜了第二位老师孙丽生。他是一位多能的陶瓷美术大家,功底深厚,尤以仕女画最为著名。他画的仕女偏重工笔重彩,很有京派风格。在与孙丽生老师一起工作的10年中,他创作绘制红楼四美瓷板画,红楼“读西厢”咖啡具等作品时,我都跟着帮手,从而对在瓷上画仕女积累了一定经验。

我真正在陶瓷绘画方面崭露头角,是1973年在河北省新器型新画面设计评比中手绘方瓶《史湘云醉眠芍药榻》荣获一等奖,业内给予很高评价。同年设计的《潇湘竹影林黛玉》印制成花纸,生产多年,颇受欢迎!

我的第三位老师刘汉宗先生,是给我启蒙恩师张子宜先生介绍拜师的。汉宗老师是中国著名的连环画家之一,绘画水平很高,他画的历史故事连环画、年画、插图人物,无一不精。记得1977年我创作瓷板小屏《红楼四美》草图,拿给刘先生看,先生拿起红铅笔在图上勾画了寥寥几笔,生动配景立马跃然纸上,令人叫绝。经过细心绘制,此作品于当年11月全部完成,烤烧成功,荣幸地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河北馆展出,广受好评!

至今记忆犹新的是,1987年北京某重要外事机关派人到我当时所在的美术瓷厂,想定制一幅“八仙过海”题材陶瓷壁画。当时厂里几位美术工程师面有难色,而我却答应下来,然后恭请汉宗先生画一幅“八仙过海”纸画,按原作放大于瓷板上。我带领几位徒弟经过一番努力,终于按期完成交货任务。成品画面气势宏大,八仙人物生动活泼各具特色;装裱在该外事部门大厅,十分醒目壮观,用户很满意。

抚今追昔,我是在前辈老师指教鼓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。除上述之外,我还向宣道平老师学习书法近8年,向杨荫



李景海创作的瓷板画《宝黛共读》

斋老师请教学习走创新之路,向苗品一老师请教画理以提高艺术修为……如此等等,难以尽述,均受益匪浅。

由于身体原因,1992年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,办了退休。在家的时间多了,但仍没离开陶瓷美术,创作题材多以红楼故事为主。

2003年7月,我以瓷板画《妙玉听琴》,瓷坐盘《洛神》为代表作,提交申报材料,参评省级大师考核,顺利被评为首届“河北工艺美术大师”。同年9月,我创作的大屏《四大美女》亮相,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唐山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陶瓷艺术展评,并荣获优秀奖。

从2003年至今20年间,我创作了多幅红楼题材大型彩绘瓷板屏,颇受赞誉;2023年9月第21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在南湖会展中心举办,盛况空前,我绘制的《游园图》大屏在会上展示,蒙业界同行赞赏有加,认为时年83岁还能画出这么精细工致的仕女画,很不简单,希望能提携后辈,传承下去。我不会忘记前辈恩师的嘱托,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,现正带着子孙和徒弟们继续耕耘陶瓷绘画,努力为唐山陶瓷艺术的振兴作出自己的贡献!

(李景海,字伯然。1940年生,唐山开平人。从事陶瓷艺术已近70年。曾任唐山陶瓷集团美术瓷厂技术厂长、总工程师等职。首届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,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。)



李景海设计的陶瓷贴花纸:林黛玉



李景海与他创作的瓷盘画《湘云醉卧》



张子宜新粉彩《麻姑献寿》提梁壶

感谢朋友刘福兴,不久前为我淘得张子宜大师1957年创作的新粉彩《麻姑献寿》提梁壶。

福兴和我一样,对唐山陶瓷有着深厚的感情,并且信息面广,眼力好。他对我研究唐山陶瓷历史文化竭力支持,尽其所能提供帮助。在我从缸窑拆迁旧址搜集瓷片标本的过程中,他不仅为我准备工具,还亲自帮我寻找瓷片。他还曾两次带我去遵化明长城旧址捡拾当年遗留的瓷片,寻找与缸窑地区瓷片标本的对应关系。近几年来,我一直请他帮我寻找张子宜大师的作品。

说来惭愧,几年前我曾有幸偶得民国年间张子宜手绘的《八仙祝寿》人物故事大瓶一对儿,可惜后来而复失,空留遗憾。每每提及此事,我都提示福兴留心为我寻找张子宜大师的作品。如今福兴不负所托,终于圆我一梦。

从题款看,此壶系丁酉年为一位周先生订制,虽然未有张子宜先生署名,但书画俱佳,一看便知是名家经典之作。壶到手后,我和几位熟悉张子宜绘瓷风格的朋友一起研究探讨,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张子宜大师的作品。

5月21日,我将此壶和其他几件唐山陶瓷精品一起在微信朋友圈展示。傍晚,突然接到李景海先生的电话。李老师非常激动地告诉我:“这把壶应该是张子宜大师的作品,我是张先生的关门弟子,张先生创作这把壶我有印象。”这令我喜出望外。

我在朋友圈展示的只是壶的正面,于是赶紧又把壶的背面图发给李景海先生,李老师找出张子宜师傅留给自己的亲笔画,认真比对,确认此件作品为张子宜大师当年的经典之作。随后,李景海先生还特意撰文,回忆了当年与张子宜先生学画的情景。

欣喜之余,我怀着恭敬之心,将张子宜大师的作品和李景海老师的文章一并珍藏起来。作为一名唐山陶瓷历史文化的研究者,我深深知道,他们师徒两代以及更多已故和健在的新老陶瓷艺术大师,为唐山陶瓷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,将一起载入唐山陶瓷发展的光辉史册!

大师佳作 传世精品

喜获张子宜新粉彩《麻姑献寿》提梁壶小记

□ 孙照程 文/图

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

——简述从《救国报》到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烽火岁月(3)

□ 王烁辉

(接上期)

2.《救国报》的发展与成熟

随着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,《救国报》只能采取游击的方式,坚持“游击办报”。而卢各寨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,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。同时,7天一版八开版的两面油印报纸,已经无法满足广大军民希望了解更多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。因此,根据党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们的计划,1941年春季,《救国报》社工作人员逐渐由卢各寨向遵化南部另一个山村鲁家峪方向迁移。

1941年夏秋之际,崔林、海山、丰原、董雪原(初志)等报社部分工作人员一度辗转至丰润县新军屯村办报,丰原、董雪原在青救会成员徐竟家居住,白天帮房东干活,夜间编印报纸,还在此地翻印过抗日小册子。当时,敌人经常从据点出来“扫荡”“圈庄”实行“治安强化”等等。有一次,在新军屯附近出现了敌情,同志们被困在洞里两天一夜,没喝一滴水,没咽一粒粮。脱险后,同志们决定尽快向鲁家峪转移。

鲁家峪在卢各寨以西大约15公里,处于丰润、玉田、遵化三县接壤地区,这个山村长约10里,南北宽约8里,山势雄莽,地形复杂,大山峪中有小山峪,素有九沟十八峪之称。这里是一个花果之乡,果树布满山沟,各山沟里的农民多半把房屋盖在自己的果园里,居住比较分散。在这里办报,便于隐蔽。山村所属的东峪和北峪,半山腰有数不清的火石洞,这是多年来农民开凿火石的遗迹。火石洞最深的有六七丈,稍为加工挖凿就可以互通连,成为山肚子的“迷宫”,这是打游击进行隐蔽很好的天然条件。

到了鲁家峪后,环境虽然艰苦,但因隐蔽条件较好,印报时间也逐步多了起来。印报所用的纸张、油墨等,平时都藏在梯田石坝地洞里,用多少取多少。大家都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,敌情不紧时,可以在屋子里印报,发现敌情时,就到火石洞里隐蔽。

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高,抗日堡垒户较多,我党很多后方机关如兵工厂、枪械厂、棉服厂、伤员疗养所、炸药厂,还有部队办的《尖兵报》等,也都设在这里,是冀东最早建立的

一小块革命根据地。

1941年冬,报社的全体人员都集中到鲁家峪,《救国报》在此扎下根来,并很快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,不仅工作人员由草创时期的几个人增加到40多人,印刷所也从一个变成两个。

在东峪,报社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。而报社以外的其他小组,如刻字组、印刷组,则在鲁家峪东面的白园、要儿峪、豹子峪一带活动,建立了报社的第二个根据地。后来,活动范围扩展到鲁家峪西面的榛子峪、井儿峪一带,又建立了第三个根据地。

此时的《救国报》不再保密,而是公开出版。报纸发行量也由创刊时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3000多份,后来又增至每期5000份,并由7日刊改为3日刊。

即使如此,仍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要求,因为他们不仅要时事新闻,而且希望能够读到与工作有关的文章和学习材料。因此,报社于1941年秋季,又出版了一种八开两版的油印通俗小报,叫作《老百姓》。它专门刊登一些时事解说、形势评论、政策解释、抗日英雄事迹以及歌曲、漫画、连环

画等等。这个通俗小报一出版,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,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,敌人曾经假冒在《老百姓》上经常发表文章、漫画的作者署名,炮制反动宣传品,混淆视听。

就是在这个时期,陈大远和布于(又名傅惠轩),这两位分别在丰润两所小学教书的青年人,怀揣着热烈的抗日火种,于同一天来到《救国报》工作。他们开始是负责刻写蜡纸,此时的《救国报》仍是油印,刻写蜡纸的任务艰巨而繁重,而陈大远和布于都是多才多艺,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造诣,而且书法娴熟飘逸,于蜡纸刻写又下功夫,所以工作上极有建树。他们刻写的蜡纸字体优美刚劲,不仅受到读者好评,也受到社长崔林极高的推崇和赞扬,说由他们刻写蜡纸印出来的报纸,不只是新闻宣传品,还是优美的艺术品。

1942年,《老百姓》报的原编辑李海平(又名林岩、杨海峰)调县教育科任职,《老百姓》报的编辑责任就落在了布于的肩上。

布于善于琢磨策划各类专栏的内容和题目,接办《老百姓》报后,报纸版面增加了许多小专栏,如:《时

事述评》《老百姓的话》《抗日英雄故事》《文化娱乐》等。这一时期的《老百姓》,无论版面的设计和内容,新闻的编排,都比较活泼、新颖,引人入胜。还不定时刊登一些连环画、漫画,有时还会发表布于自己按群众顺口口唱的旋律和曲调谱写的歌词。

因为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的作用,1941年,在冀东区党分委领导下,又成立了一个“抗敌文化社”,翻印出版一些政治、文化学习材料,编印八开两版的文艺刊物《文艺轻骑队》。这年秋季,翻印、出版学习材料的任务,也由《救国报》社担负起来,同时出版一种32开本的综合性油印刊物《国防最前线》,其编辑、出版等业务都由《救国报》社代管。《救国报》时期的附属刊物后文将有详述。

冀东地区被敌人封锁得过于严密,根据地以外的消息来源,始终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为此,1942年初,军区司令部拨给报社一部收报机,并派来报务员,组成了报社的电台小组。这个极为难得的报务机构设置于鲁家峪以东的豹子峪。可惜报务员原来只熟悉工作联络的收发报业务,不知道怎样才能接收到延

安新华社的电讯新闻。尽管一直在摸索、试验,可是效果不理想。

此时,报社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,社部之下设立了编辑组、刻字组、总务科、电台等机构;两个印刷所分工也更明确:第一印刷所印刷出版学习读物,第二印刷所负责印刷《救国报》和《老百姓》报。

社部、编辑组、总务科加上《国防最前线》社以及第一印刷所设在东峪(化名“五合”),驻在东峪的有李杉(崔林)、丰原、高元、高翔、海山、林岩、季凤、吕新、武申、刘义兴、程义、文光、陈仲、兰森、贾敏、红叶、周芝、思奇、林月、史涛、山桥、沈同、杜文大等同志;第二印刷所和《老百姓》报的编辑部设在北峪(化名“滨江”),驻在北峪的有布于、陈大远、徐楠、范捷民(尹铭钰)、武迎山、刘敏(严德成)、白光、张助国、伊田、寒潮、杜凤(冯国玺)、石方、贺民、晓亭等同志;报社电台设在豹子峪,生华(庄华)、列华、西华在这里工作。

还有两名随军记者,管桦和任朴。实际上,这时候的《救国报》已经发展成为报社和出版社的综合体。

(待续)